

读史札记

勇于不敢

□ 滴水水

建安十八年(公元213年),曹操为报赤壁之仇,在平定凉州后,亲率步骑四十万,欲一雪前耻,痛击孙吴。当时,曹操的势力范围已抵居巢,含山,无为则被东吴控制。曹操要南下伐吴,一定要从巢湖经濡须水入江。东吴十分清楚,如果濡须水口不保,长江防线就会洞门大开,曹操随时都可能直逼东吴的都城建业(南京)。孙权早知曹操必有雪仇之战,于建安十六年,用吕蒙之策,扬水军之长,在濡须口搭建城寨。两军接战,曹军就被孙权斩“得三千余人”“溺死者亦数千”。双方相峙,曹军坚守不出。孙权数次挑战,甚至亲自乘小船进入曹军大营,“行五六里,回来还作鼓吹”,曹操则“敕军中皆精严”“弓弩不得妄发”。两军对峙月余,孙权给曹操写了封“春水方生,公宜速去”的书信,曹操接信竟然说:“孙权不欺孤”,撤军而归。

在《三国志》《资治通鉴》里读罢此事,甚为不解。曹操是“天下之雄”,此战四十万大军对七万东吴军,即使初战有失,充其量也不过万,怎么会孙权屡次挑战,而他会胆小如鼠,坚守不出?“公宜速去”,作为子辈的孙权“此令”一出,他怎么会如此“听令”,率大军而归呢?

研究多种史料后,我深深感到,曹操此举,正是孔子所说的“勇于不敢”。

曹操一生都不是要跟孙吴的匹夫。“为将当有怯弱时”,是他之所以成就霸业的奥妙之一。《资治通鉴》和《三国志·魏书·夏侯渊传》记载,曹将夏侯渊勇猛如虎,斩梁兴,逐马超,破韩遂,次宋建,横扫羌族,屠各等外族势力,虎步关右。越是打胜仗,曹操就越担心他,屡次告诫他:“为将当有怯弱时,不可恃勇也。”夏侯渊并没有把曹操的告诫当回事,一味恃勇,最终战死在定军山下。曹操身经百战,大小之战都会想到自己的弱点和不足,全心而战,全力以赴。临事而惧,好谋而成。他讲的“怯弱”,不是畏葸不前,也不是一筹莫展,而是“不恃”“专勇”,知己不足,智勇兼备。既有逢敌亮剑之勇,也有战战兢兢之心,不妄狂,不逞匹夫之勇。

这使我想起《道德经》里老子说的两句话:“勇于敢则杀;勇于不敢则活。”一个人什么都不顾忌,一味恃勇,则充满凶险,而勇于不敢,有所顾忌,则处事就能稳妥灵活。子路曾经问孔子:您和我,谁比较适合带兵打仗?孔子说:我适合。孔子是一个大儒,怎么适合带兵打仗呢?子路于是反问道:您不是常说我很勇敢吗?孔子说:我可不仅勇敢,还勇于不敢呀!”子路又请教孔子:如果您统帅三军,您会选择谁来充当助手?孔子答道:那种空手与虎搏斗,徒步跋涉急流,纵然身死也无悔意的勇猛之人,并不值得赞赏。而那些遇事谨慎冷静、考虑周详、善谋良策去成就事业之人,则可以共事。(见《论语》相关资料)

曹操“勇于不敢”,首先是“春水方生”。他清楚东吴兵马善于水战,而自己的部队不谙水战。兵临濡须,他本想立即开战,让东吴水军在上船之际未形成战斗力之前,即被击败。可谁知东吴军不在岸上,而在濡须口修建的水寨中。战事一开,曹军派出许多小船渡到水洲上;而东吴兵则将其团团围住,双方在水上展开了激战,东吴军扬水军之长,曹军则充分暴露了水战之短,初战竟失万人。而“春水方生”,江水大涨,曹军将更加丧失战斗力。曹操一生征战无数,胜多败少。然而数次南下都未能突破长江天险,大多数都败在了长江上。赤壁之战,江浪之中,将士晕船,又广染瘟疫,曹操记忆犹新。“嗟乎!固天所以隔南北也!”(曹丕语)

曹操“勇于不敢”的第二个原因是,此战相峙之际,刘备正在益州和刘璋争夺地盘。如果四十万大军陷于水战之中,不仅攻伐难以得胜,刘备则会乘机得个大便宜。这种欲取不得反而有失的蠢事,曹操是绝不会干的。当然,曹操“勇于不敢”应还有内政方面的原因。他率大军南下,大本营中荀彧已经去世。以前征战,荀彧主持后方,他比较放心,现在荀彧一死,后方的稳固是他心中一直放不下的。南征之前,他已经有了“参拜不名,剑履上殿”的待遇。南下征战,他不是真正为了那“令诸侯”的“挟天子”,而是为了自己的霸业。朝堂之事,胜过一切。

所以“公宜速去”,不是孙权之令,而是曹操之谋。他率大军南下,“临江饮马”是其为一统天下的“勇于敢”,而战事一开,相峙月余,“春水方生”乃“御军还”,是其审时度势、从长计议的“勇于不敢”。

勇于不敢何止战场,商场政坛都应如此。

捋一捋镇江名门望族丁氏家族

□ 徐苏

镇江丁氏家族源远流长。镇江丁氏的远祖世居北方。北宋末年靖康之难,金人掳走徽宗、钦宗及大批官员,族人丁略,元祐年间(1086-1093)以“魁才科”进士授中书,历官洗马,也在其内。靖康年间,族人丁素在朝为官,随康王赵构(后为南宋高宗皇帝)一起南渡,初寓居金陵(南京),后因故死葬镇江丹徒。南宋后期,族人丁煜权知镇江府事,因祖莹在镇江,离任后遂“卜宅丹徒城东而家焉”。由此可知,后人把丁煜作为镇江丁氏的始祖。

丁煜(1195-1264),字景暘。以荫补朝散郎,南宋进士,绍定二年(1229)通判镇江,迁太府少卿,淮东总领;嘉熙四年(1240),权知镇江府事,总辖苏、湖、常、润四州军民兼督粮餉。

丁氏家族发迹于北宋,古籍镇江丹徒后,支系行增,族丁兴旺,传承有为,人才辈出,读书求学和科举为官者不绝,成为江南望族。他们世代以儒为业,以读书为荣,涌现出许多杰出的人才,族里的进士、举人不断,读书风气特别浓厚,许多人著书立说,修身养性,成为知名的学者。

明代族人读书成才的典范

丁元吉(1427-1491),明代初期文学家。字无咎,人称“易洞先生”。丹徒人。他的父亲丁宁,考中过举人,做过建宁右卫经历这样的小官。因饥荒连年,弃官家居,所以家庭十分的贫困。但这些都未改变丁元吉喜欢读书的习惯,他精研《易》理,并将自己的居所名为“易洞”,这就是后来学者为什么尊称其“易洞先生”的原因。为了生计,丁元吉放弃了科举业,未弱冠即教授乡里,并以谆谆善教而受到生徒的敬重。

明代宰相靳贵对丁元吉非常敬重,曾从学于他的门下。丁元吉去世时,他专门写了《哭丁易洞先生》的诗,诗中有“华岳中峰一夕摧,南徐矜佩更谁依。行藏空载伊川易,笑语闻坡老”的句子,表达了对先生的怀念之情。

丁元吉为人宽厚仁爱,才思宏远,他的诗词古文都很好,对史学也做过研究,喜欢考古论事,又精通医学,所以在地方上是一个难得的人才。后来官府慕其学问深,人品好,聘他编纂《成化镇江府志》。镇江知府林一鹤欲推荐他出来做官,以不愿做官而辞。著有《陆右丞蹈海录》1卷补1卷,《丁易洞先生文集》64卷。

丁玘(1457-1503)字玉夫,号朴斋,丹徒人,成化十四年(1478)考中进士,授中书舍人。成化二十年,二十一年星殒,皇帝令其直言,曾上奏数千言,论治道本末,时政得失。主张“振纲纪,正风俗,慎用人,苏民困,理财用”等,又弹劾李孜甫及僧继晓等人,疏留中,因他事被谪普安州判,历任广东按察副使、提学副使、四川按察使等。丁玘对经学有兴趣,读过许多经学方面的著作,也通诗文,喜吟诵,著有《洪范正误》1卷,《四礼仪注》4卷,《大学疑义》1卷,《初斋集》10卷。



丁绍周书法

丁璫,字敬夫,号点白,丹徒人。明正德十二年(1517)进士,授吏部主事,改工部,任温州知府,升浙江兵备副使。为官时,他注重民生,并发挥了自已精通医学的特长。他发现温州当地的行医人大多不喜欢读《内经》《素问》等书,这样不利于医术的提高,他就找来了元滑寿的《素问钞》作为蓝本,又参考了唐人王冰的《素问注》,最后编辑成《素问钞补》12卷行世,并在书后附上了《五经六气主客图》和《诊家枢要》,后来此书被列入《四库全书》存目之中。

清代族人传授学业的楷模

丁绍周(1821-1873),字谦甫,号亦溪,丹徒人。道光三十年(1850)进士,翰林院编修,历任詹事府中允,国史馆协修,实录馆纂修,功臣馆纂修,湖广道监察御史,京畿道监察御史,内閣侍读学士,太仆寺少卿,光禄寺正卿,浙江学政等职。

丁绍周是一位勤于政务,忠于职守的好官员,他出任浙江学政时已年过半百且体弱多病,却仍然带病坚持工作。终因操劳过度,于同治十二年(1873)卒于浙江督学官署任上。他还是晚清的著名诗人,书画家,其山水画笔墨淋漓,不以枯俭为尚,《清画家诗史》中载其传;其诗文和联语正统而工整,不尚奢华,著有《蜀游草诗集》《浮玉山房试帖》等。

丁立瀛(1844-1907),字丽生,号伯山。咸丰三年九月时随父亲丁绍周从镇江迁徙苏北东台城。同治十年(1871)中进士,钦点翰林院庶吉士,散馆授编修,后任六科给事中(礼部掌印),再任顺天府府丞。光绪二十二年(1896)奉旨任镇江开设商务局;光绪二十四年(1898)在京参与“戊戌变法”。光绪二十八年(1902)起任“江苏全省高等学堂”(原江阴南菁书院)总教习。

丁立钧(1854-1902),丁立瀛胞弟。光绪六年(1880)进士,钦点翰林院庶吉士,散馆授编修;光绪二十一年在北京参加“强学会”,当选为总董;光绪二十三年出任山东沂州府知府;光绪二十四年辞官;光绪二十五年

(1899),丁立钧应“南菁书院”之聘出任书院院长。光绪二十七年(1901),“南菁书院”改为“南菁高等学堂”,又经江苏学政李殿林奏请改称“江苏全省高等学堂”,丁立钧改任学堂总教习。他担任总教习后,即以当初“推新政”的精神和勇气来改革学堂教育,彻底废除旧式教育,全力推行新式教学,在每月的朔日(初一)和望日(十五)开设“会讲”,由学堂监督及教员集诸生于讲堂,开讲伦理、掌故以及科学和外语等科目,从而将学堂办得生动活泼、朝气蓬勃。丁立钧晚年时因右手患疾,改用左手写字作画。著有《历代大札辨误》《昭代尺牍小传续集》《清画录》《东藩事略》《历朝纪事本末》《南菁书院文集》等。

近现代族人博学多才的榜样

近现代族人丁传靖(1870-1930),字秀甫,号闾公,丹徒人。宣统二年(1909),经帝师陈宝琛推荐,丁传靖赴北京担任礼学馆修纂。民国二年(1913),入江苏督军冯国璋帐下为幕僚。民国五年(1916)冯国璋当选为总统后,冯氏到北京担任总统府秘书。民国七年(1918)冯国璋被段祺瑞逼迫下台后,丁传靖亦移居天津。从此以后,他专心致志笔耕写作,创作了大量脍炙人口、流传后世的优秀作品,被公认为清末民初时著作等身的文坛奇才。

丁传靖的著作现可考知的约30种,他的作品题材广泛,涉猎戏曲传奇、诗词歌赋、古文骈文、文史考证等方面,诸如《霜天碧》《沧桑艳》《闾公文存》《闾公诗存》《宋人轶事汇编》《清大学士年表》《督抚年表》《历代帝王世系宗谱》《清代名人志录》《东林别传》《甲乙之际宫闈录》(张文贞公年谱)等。

丁琪(1895-1975),原名丁家琪,镇江人,字柏岩,书画评论家。1920年南京政法大学毕业,先任交通部主事,后任国民政府经济铁路管理局,正太铁路管理局等。1949年后在上海市博物馆、上海市图书馆工作。家富收藏,特别对本邑



丁石孙

历代书画家的作品着力搜集,热心研究历史及书画理论,根据清代镇江以张夕庵为首的诸画家的特点及成就,首先提出“京江画派”的理论,现已为美术史界所确认。著作有《中国女画家小传》《京江画人征略》等。

丁石孙(1927-2019),原名丁永安,生于上海,祖籍镇江。数学家、教育学家,长期从事数学教学和行政管理工作,在代数、数论、应用代数、代数学理论的研究方面取得多项成果。历任北京大学数学力学系助教、讲师、教授,数学系副主任、主任,北京大学校长。中国数学会副理事长,中国教育国际交流协会副会长,中国海外交流协会常务理事,中国外交学会理事,欧美同学会理事,周培源基金会委员会副主任,民盟第六届中央副主席,民盟第七届至第九届中央主席,第九届、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。

丁石孙长期从事代数与代数数论的教学与研究,对数学教育的目标和方法提出了独到的见解。提出了程序自动化的研究课题,是在中国开展代数数论研究的倡导者之一。在平衡教学与研究上,丁石孙从长计议。在他看来,中国数学起点相对落后,数学家的重心不是要放在自己搞研究和出论文上,而是要学习世界上最先进的方法和理论,并把学生教好,培养下一代人才,让后来人赶上世界先进水平。为此,他编著了《高等代数讲义》《高等代数简明教程》等教材,常年被高校数学专业使用。季羨林先生在北大百年校庆时这样说:北大历史上有两位校长值得记住,一位是蔡元培,另一位是丁石孙。

王叔承焦山品鲊

□ 刘俏到



花雷摄



黄跃雄绘

春夏之交,江鲜鲊鱼正当季。嘉靖四十五年(1566年)五月,明代布衣文人王叔承出游镇江,先登金山后临焦山,亲眼看到江湾之中捕捞船出没。游完焦山之后,王叔承一行就地买来“鲜活色青,鳃微开合”的江鲊,现烹现酌尽而返。这些细节都写在王叔承的《游金焦两山记》之中,更有王诗为证:“鸟外渔歌断水烟,隔江唤过打鱼船。鲊鱼出网鲜犹活,笑掷船头三百钱。”

自古而今,天下鲊鱼出长江,长江鲊鱼出镇

江,按理说其价格也相当可观。要知道《金瓶梅》里西门庆收礼,纹银百两都不曾放在眼里,却对四十斤鲜鲊鱼颇为得意,忍不住要跟帮闲应伯爵显摆一番。清朝时,江南豪门抢食鲜鲊,更有“江城一尾卖千钱”之价。而王叔承出游镇江,陪游的焦山僧人介绍,山下江中的现捕活鲊“斤可十八钱”,只能感慨镇江渔民可真是相当朴实厚道。

王叔承是苏州吴县人,自幼生活贫困,很长时间居无定所。年轻时应试未举,二十出头被推荐到南京的赵王朱厚煜幕府,出游镇江前才入过北京的大学士李春芳幕府。但他性格孤傲,不喜寄人篱下,常因嗜酒误事,两次入幕都未长留。此后他再无进取之意,终其一生好酒喜游,遍游齐鲁燕赵闽楚等地。好在彼时名士出游吃喝不愁,正如他这顿既鲜又活且便宜的鲜鲊小宴,区区“三百钱”而已,不但可以笑掷出手,而且多半有人主动埋单。

王叔承焦山品鲊之后,注意到焦山石壁刻有多年前杨继盛所书“椒山”二字。杨继盛乃是明朝中期著名的硬骨头谏臣,多年前弹劾严嵩“五奸十大罪”,终遭严党诬陷下狱直至身亡。杨继盛自号椒山,正与焦山同音。王叔承猜测杨继盛当年勒名于石或有自我负重之意,于是感慨其“竟以劾奸论死,忠臣处士,名节昭著”。

杨继盛生前只是个从五品的员外郎,文化史上也没什么建树,但却是个明史绕不开的人物。他出身贫寒,胸怀大志,素以清廉出名,

虽贬谪而不悔。嘉靖三十一年,他被再次起用,进京赴任时路过镇江游览焦山,留下一首很有意思的诗:“杨子怀人涉扬子,椒山无意合焦山;地灵人杰天然巧,仿佛神游太古间。”既有杨子与扬子、椒山与焦山之巧,又暗含神游六荒、宏图待展之志,正与其欣喜心境相合。诗成后第二年,杨继盛上了《请诛贼臣疏》弹劾严嵩,随后落狱,两年后被处决。

杨继盛的一些墨宝和遗物,经过相当一段时间流转,曾收藏在焦山。两百六十多年后的清朝名臣林则徐多次登临焦山,其中至少两次是为此而来。第一次是在道光二年闰三月,林则徐赴京补官,途中游览焦山想一览杨继盛墨宝,“惜主者他适,未得借观,为怅然者久之”,只好带着遗憾而去。林则徐随后进京面圣,道光帝夸奖之余让他先回江南,承诺“遇有道缺即给汝补”。返程于六月初一再赴焦山仰止轩,在镇江友人陪同下顺利看到杨继盛遗物藏品,总算了却一桩心愿。

不过,明朝嘉靖年间出游的王叔承尚只见到“椒山”碑刻。毕竟此时离杨继盛去世才十多年,而签阅奏疏决杨继盛的嘉靖皇帝仍然在世,杨案尚不具备平反的条件,王叔承的游记里只能留下十余字感慨。到了清朝林则徐登临焦山时,已然时过境迁,则能看到焦祠之后供着杨继盛塑像,还有两百六十多年里几搜罗得来与杨继盛有关的碑帖、诗作、信札等,其中包括《寄凤洲》一文。凤洲即苏州王世贞,有明一代著名的文学家史学家,恰是王叔承的同乡文友。

王世贞与杨继盛同科进士,两人志趣相投多年好友,都是不肯依附权臣严嵩之人。当年杨继盛惨遭处决前后,王世贞跑前跑后施以援手,都

被奸相严嵩看在眼里恨在心里,加上王世贞父亲王忬与严党向来不合,最终酿成嘉靖三十九年王忬被斩的惨剧。之后,王世贞就带着弟弟王世懋扶柩归乡,从此远离政坛文坛。

而王叔承焦山品鲊之时,四十岁的王世贞已幽居太仓六年,处在惨痛家难之后的人生低谷期。这六年里,他前三年为父亲守孝,后三年慢慢从沉痛中走出,交游周边文士,足迹遍及太湖周边。

好在这年已是嘉靖四十五年。虽然这年除夕,王世贞笔下仍有着“飞腾向来意,空付一清然”的感伤,但实际上嘉靖皇帝已在半月前去世,隆庆皇帝随后继位,父亲王忬和挚友杨继盛都将迎来平反。只不过古代信息传递缓慢,王世贞尚不知情。

一旦两朝更替的消息传到江南,随后的正月初七,王世贞就将从苏州出发,经长江转运河进京申诉。那时天气尚寒,但他路过镇江金山时诗留下“春山春望郁葱葱,矫首扶桑黛色开”的诗句,情绪一展而新。确实,他很快即可走出家族阴影,为自己的仕途与文途打开局面,稳步开启独立文坛二十年的岁月。

对于王叔承来说,如果晚两年登游焦山品鲊,就能使用隆庆皇帝赐予杨继盛的谥号“杨忠愍公”,只怕游记里将另有一番春秋。但那有什么关系呢?看王叔承面对“椒山”石刻油然而生的感慨,想必他与杨继盛、王世贞诸士早已惺惺相惜,毕竟他属于王世贞常有唱和交游的人,而性情中人更易心灵相通——我敢打赌有那么一次,当王对酌时曾因杨继盛留在焦山的二字石刻碰过一杯。至于有没有镇江鲊鱼佐酒,可就难说了。

